

中医复兴论

李致重 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复兴论

李致重 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登记证号: (京) 075 号

内 容 提 要

到目前为止,由人类理性思维而产生的科学,大体可分为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或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两大类。中医与西医双水分流、各类其属。尽管两者防治疾病的目的相同,由于各自以人身整体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相互的研究方法便各不相同,所形成的概念、范畴也各成体系。在“近代科学主义”冲击下的一百年来,用还原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的思潮,一直困扰着中医按其内在科学规律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本书从东西方文化、科学的比较研究入手,以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基础理论比较研究为核心,对中医界共同关注的百年困惑,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理性思考。论证了中医学核心概念的现代定义,讨论了中医学在当代人类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中医百年困惑的文化、历史原因,探讨了中医学复兴的可行性与可持续发展性,并就相关的学术专题,阐述了作者的见解。论据翔实、逻辑严谨、语言平实、观点明确。对于初学中医的学生和从事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专业工作者,对于中医未来发展的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复兴论/李致重主编.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067-2843-5

I. 中... II. 李... III. 中国医药学—文集 IV. R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103 号

*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 22 路)
(邮政编码 100088)

北京市平谷区早立印刷厂 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

开本 850×1168mm $1/_{32}$ 印张 12

字数 294 千字 印数 1—25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010-62244206)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中医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形成了人类医学史上成熟的、也是最早的一种医学。两千多年以后的 20 世纪后半叶，当人类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代表的系统性科学的问世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没有被‘近代科学主义’蒙蔽的中国人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经历了数千年防病治病实践检验的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理论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在文化多元并存、共同繁荣的当代，如果有一天当世界真正认识到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而中医学在自己的故乡‘被西化’、‘被改造’而萎缩、衰落，一百年里经历、参与其事的中国人将该说什么好呢？因为我相信，这份答卷早晚要交，而且一定要交的。”

(摘自“走出中医学术的百年困惑”)

邓 序

中医药学植根于民族文化。当民族文化受到过头的冲击，再加上民族虚无主义者的兴风作浪，中医药学虽然顽强地活了下来，没有像在日本那样被消灭，但是终究免不了受尽被轻视、歧视与排斥的不平等待遇。解放前中医药已奄奄一息！不少人认为中国科学自 15 世纪以来便落后了，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科学，当然也落后了。甚至有人说中医虽然能治好病，也不能算科学，把中医学排挤在科学殿堂之外。所以解放后有人提出要用西医学改造中医学。这种思想，直到今天在中国医学界，甚至在中医队伍中仍有市场。在国内，这种思想毒害不可轻视。

中国社会科学家里森教授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中医药学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遥看国外，自 70 年代以后，美国开始出现针灸热，其后出现中医热，针灸已经进入医疗保险。美国的中医院校，至 2000 年已有 40 所。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已经承认中医的专业地位，德国的中医院病人很多。中医药在 20 世纪末正大步走向世界。可以预测，这个第五大发明将于 21 世纪发出耀眼的光辉。

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是中华文化的瑰宝。20 世纪的实证科学技术对这个理论体系的证实尚一筹莫展，无法说明其内涵独特、超前的科学性。只有到了 21 世纪，新科技与中医相结合，才能促进中医药的飞跃发展，成为未来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的理论来源于“宏观”的研究，西方医学的根本在于“微观”的研究。科学发展到 21 世纪，将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世纪。这是中医药学 21 世纪重放光辉的理论依据。

李致重教授，是热爱中医药学的中年一辈的中坚学者之一。他和我们老一辈一样，是把中医药学的发展，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我们对他那种对中医药学执著的热爱感到欣慰。祈望中医药界这样的学者越多越好。

当此《中医复兴论》行将出版之际，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是一本用心血写成的好书。故乐为之序。

邓铁涛

2002 年 4 月 15 日

焦 序

公元前 500 年，中国有托黄帝之名者，著《黄帝内经》，含素问、灵枢各 81 篇。穷究天人合一之理，阐述脏腑经络之名，详辨五运六气之异，明论病机针药之殊，而医道立。汉张仲景宗《内经》之旨，作《伤寒杂病论》，垂辨证之规范，示论治之法度，而医方全。是医道发源于黄帝，承其道而开来者仲景，故仲景犹儒门之孔子也。迨唐孙真人、巢元方，宋王叔和、林亿，元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张子和，明李时珍、张景岳、李士材，清叶天士、喻嘉言、吴鞠通、陈修园等等著名医家，深研细味，循道发挥，祖《内经》、《伤寒》圣矩，明辨三部九候之脉理，备载男妇老幼诸病用药之异同，渊源数千年，其道洋洋。经验之丰富，理论之精湛，著作之巨宏，可谓洞穷乾坤之奥意，故理法方药渐趋系统，医学理论日益昌明。其养生之道，长寿之诀，扶危济困，起死回生，诚世人共臻寿域，慈航普济之仁心仁术也。岂止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之所赖，实乃造福人类之深远宏旨。

史至晚清，朝政不纲，贪污腐化，外患频扰，列强入侵胁迫立卖国条约，崇洋媚外惟取外人是效，致全国满目疮

痍，民怨沸腾，卒至亡国。民国间，晚清遗留之祸，未能尽克，遂有“废止中医案”出。经全国中医界墨殊笔伐，函电交驰，据理争辩，群起抗议，而令未敢通过，不了了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了中医政策，实为中医之洪福也。但 20 世纪 50 代曾有王斌等人用西医内容考试中医之忧，幸由中央政府及时纠正。60 年代“十年动乱”，轻视中华文化、中医理论，藉现代科学为名据，致中医理论极遭阉割，虽有中医政策拯救维系，但已远非炎黄医学所固有。对中医学深奥邃密的天人合一，整体系统，动变制化的系统理论，不究深意，横加诋毁。更有甚者，则巧立名目，欲以西学而代之，实为未解中华文化之精髓，而招致贻笑于今日者也。当此之时，中医界自当吸取教训，团结一致，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奋斗是务。

现代学者李致重先生，是我国中医界学验俱丰的医学专家，曾多年从事中医的临床与研究，主编过《中医沉思录》，发表了中医学术论文 120 余篇。对中医学术上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中医的科学定位，若干核心概念的定义，中医现代化的思考，医、教、研的反思与改进等等，通过沉思和研究，述之以文。最近，将多年来发表的宏论，汇集成册，名之曰《中医复兴论》。李君曾将本书文稿，寄余征求意见，真乃先睹为快。书中对每一问题，均一一结合理论与实践，详明辨析之，深刻阐

述之，足见其理论研究之深入，临床体会之细微。有关中医发展与改进之理，亦有论、有据，实为难得之宏论名篇也，堪称复兴中医之警铎，振兴中医之要略。李君振兴中医之志虽与吾同，然胜于兰之识令我兴奋。故乐为之序。

焦树德

2002 年 11 月于北京自勉斋

杨 序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在医疗保健方面的独特风格和贡献，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良好影响。

如何使祖先留下的遗产在新的时代发挥作用，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必然引起争论的话题。中医学也不例外。特别是在与西医学并存，而且西医学占据医疗主流地位的情况下，如何发展中医和发挥中医学的作用，一方面坚持中西医结合研究来发展中医，一方面则主张中医独立研究来发展中医。经年累月之后，中医学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局限，普遍出现了以西医理论证明中医疗效的研究来代替中医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否定中医理论），以西医植物药的研究来代替中药的研究（这实际上否定中药是根据中医理论使用的药物，而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学科的发展竟然需要另一个学科来越俎代庖，并且即将被该学科所取代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对于如何保存和发展中医学来说，已经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能再继续沉默的时候了。

中医学的日益萎缩引起了若干人的深思和忧虑，他们分别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李致重先生是从中医自

身研究的角度来探讨发展中医的一个代表。本书收录的三十余篇文章，反映了他在发展中医方面经年累月，呕心沥血的研究和反思，反映出他对中医事业的忠贞和对中医学未来的忧虑。这种持之以恒和勇于发表自己观点的精神，使我深感敬佩！

“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我对中医的发展也许有着与李先生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是人们只要不断地进行思考、讨论，终究能够找到发展中医的最佳途径。所以，沉默是要不得的，沉默就意味着灭亡。只有学术争鸣，中医才能发展。鲁迅先生“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警句，值得我们三思。

杨维益

2002年4月20日

前 言

19 世纪后半叶和 20 世纪，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瑰宝的中医学，则随之经历了一个在冲击中陷于困惑，在困惑中力求生存的艰难历程。这一历程，习惯上把它称之为“百年困惑”。近 20 年来，在深入、认真地反思其原因时，才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一种有形无形的时代锁链至今仍然在盘根错节地羁绊着中医学。

一、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撑，是中医百年困惑的时代特点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出现了维新改良、励精图治的苗头，也产生了自怨、自卑的情绪。多半个世纪后的“五四”运动，在请进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又出现了“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的浪潮。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以自己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拾级而上。而中国的近代，却没有为自己营造出各种文化多元并存、共同繁荣的和谐环境。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文化科学上，非此即彼的幼稚病和自毁传统的劣根性，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清除。20 世纪 60 年代，当其他国家和地区正纷纷从“工业革命阶段”迈向“新技术革命阶段”的时候，中国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如火如荼地搞现代“焚书坑儒”，革文化的命。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无疑是悲哀的民族。把近代的贫穷、落后和挨打原因，一味归咎于历史和祖宗，这其实正是一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撑的变态表现。

二、中国哲学、科学方法论的扭曲，是中医陷于困惑的重要原因

形成于春秋、秦汉之际的中医学，是以当时的文化科学为土壤，以当时的哲学为基石的。那一时期，中国与东、西方的几个文明古国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而中国代表着东方文化的中心。那是人类文明史上仅有的两个并列的文化高峰之一，至今仍然是人类文明（包括当代文明）的基础。但是在中国近代的一百年里，《易经》、《老子》以及儒家学说中许多不朽的哲学思想，时而被说成是“客观唯心主义”，时而被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而印度人没有忘记佛陀，西方人更没有冷落他们的古希腊“三哲”；偏偏留在中国人的心里的诸子百家，只不过一个个皮魂落魄的躯壳。作为中医学方法论渊源的阴阳五行学说，因此而同病相怜，长期被扣上了“落后”、“封建”、“唯心”的帽子。好在中医学数千年来无可辩驳的临床疗效，才勉强为阴阳五行学说保住了一个“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说法。其实“朴素”和“自发”，已经是对其哲学价值的贬抑。况且，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所包含的方法论内容之丰富，并不仅仅限于哲学这一个方面。

20 世纪后半叶，奉行唯物辩证法的不少中国人，竟然连“物质”这一个核心概念也被无知地歪曲了。难怪毛泽东多次抱怨说：“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按照列宁的解释：“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8 页）这个“客观实在”，与亚里士多德说的“万有”，与老子论“有无相生”所说的“有”，尤其与佛陀说的色、受、想、行、识之“五蕴”，并无本质的区别。所指的都是“物质”关于“客观实在”这一基本属性的范畴。偏偏在近代的中医学界，“物质”这一概念被物理学、化学中关于结构、形态学说的含义取代了。于是，佛陀说的

受、想、行、识，以及关于物质运动过程的信息、状态，统统被排除在物质的范畴之外。这样一来，不仅中医学赖以形成的方法论“不科学”了，而且作为中医学研究对象的“证候”，也在物理学、化学的至上标准下，被剥去了“客观实在”这一物质的根本属性。所以一百年来，中医界为之担心的或者通过“科研”孜孜以求的，就是希望能为中医学“找到物质基础”。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所获知的“证候”，怎么就不具有“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了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每一门科学形成和存在的根本要素。这两者的科学价值被歪曲之后，中医学便彻底地陷入到风雨飘摇之中。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医学受歧视、被摧残的命运，则有理难逃了。

三、中医学在“西化”中“退化”，是百年困惑的主要表现

一定的研究对象，决定或选择了一定的研究方法。中医学和西医学研究的客体固然都是人，然而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所以在人的身上包罗了万物的种种属性。作为医学研究的对象来说，中医学和西医学两者，其实各自只研究了关于人的一部分物质属性。据此，中、西医各自选择的研究方法则各不相同。于是，用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各自不同的对象，便形成了两种概念、范畴大不相同的医学科学体系。

在两种医学并存的近代中国，影响人们对中医学准确、公正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已知，对未知领域的排斥。这种存在于一个人头脑里的排斥，是当代分析科学的潮流所掩盖、所决定的。本质上讲，是从先入为主的“形下类”科学的理念出发，在对“形上类”科学理解不深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偏执性的抗拒心理。一旦一个人先学习了“形而下”的西医生理、解剖知识，再学习中医时，固有的已知总是顽固而又不自觉地用直观的形态学、组织学观点，来诠释、修改甚至排斥“形而上”的中医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概念。然而，正是思维

科学中的这一常识，被人们疏忽了。尤其在民族文化心理失衡，在哲学、科学方法论处于贫困的情况下，“中医西医化”几乎成为一百年来社会上对待中医学的潮流性偏见。从余云岫 20 世纪 30 年代的“废止中医论”，到 50 年代初的“改造旧医实施方案”；从建国初期的“中医科学化”，到 1958 年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敲定的“悖论”……虽然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其核心却是与科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风马牛不相及的同一个偏见——中医学是过时、封建、落后、不科学的，要用西医基础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验证、解释、改造，使其科学化。这种潮流性偏见与这一时期行政绝对权威交织在一起，像一个戴在中医头上的“紧箍咒”，牢牢地将中医学置身在生存危机之中，并渗透在医疗、教育、研究、管理的各个方面。尽管中医为此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却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无可奈何、不了了之的同一种结果。直到今天，口头上唱着“中医现代化”的调子，而背后葫芦里的药，仍然是“中医不科学”、“中医西医化”。

四、学风空疏、人心浮躁，进一步加剧了百年困惑

在一次次潮流性冲击之下，中医界日渐学风空疏、人心浮躁。一方面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人们做学问的耐力常常不够，著书立说的兴趣却格外浓厚；与历史上各个时代相比，当代出书的数量倍增，而心得独具的力作却甚少。大多数丛书中随处可见相互传抄的转手材料，而在反复传抄中竟常常错谬百出甚至面目全非。另一方面是“朝立一旨，暮即成宗”。某一个“大人物”的一句话，或者其他科学领域的一个新学说，都可能招来蜂拥而上的热情，立即被拿去奉为经典。或旋风式地追逐其后，或藉以对中医妄加诠释，并且把这种做法常常自命为创新。

应该说，“内在于自身传统的历史性演进”，是各门学科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发展轨迹。而随着文化科学的外部环境以及语言环境的变化，在语词上对其概念的定义做出必要的、不失其本

来内涵的界定，是各门科学在不断自我演进中的理论任务。况且，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自我理论演进，它永远是、而且也只能是本学科极少数精英之间所进行的严谨、圣洁的思维创造，绝非“有心栽花”或“群众运动”所能实现。然而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医学”、“中药学”、“证候”、“辨证论治”以及“中西医结合”等等范畴性的核心概念，中医界并没有为其做出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定义或解释。而以全方位之势开展的“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中医病证“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创造“中西医结合学”等等，却已经轰轰烈烈地动员、宣传、推进、贯彻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了。这种本末倒置而又颇具“群众运动”形式的习惯做法，沿袭着与“大跃进”时期相同的基因——“情况不明干劲大，心中无数主意多”。尤其在学科的理论问题上，概念、范畴的定义不清，这个学科自我完善、发展的出发点或者起跑线将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由此所开展的技术性研究，也将因而失去了科学的依据。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找准起跑线的“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中医病、证“标准化”、“规范化”以及“中西医结合学”的种种努力，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医的百年困惑。

可见，“潮流”这东西，有时候颇像瘟疫。它虽然产生于缺少理性或文化科学底蕴的情况下，一种一轰而起的盲目从众现象，但是往往因为其声势汹涌，每令人不可抵御，甚至有理莫辨。不过，实践和历史是对其进行检验的真正标准。一切违背科学的无本之木，在科学面前终将彻底枯萎。所以对待潮流，需要的倒是其反面——实事求是的冷静和沉思！

“物到极时终必变”。20世纪70年代，从单独由西医承担防病治病的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唤。接着从80年代“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写入国家《宪法》以来，1985年中央书记处做出了“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

等重要的地位”，“中医不能丢”的指示；1991年国家又把“中西医并重”作为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这一切都表明，中医走出百年困惑的时机正在成熟。现在的关键，全在于中医界自身。为此，在今天的道路上，摆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牢固确立文化科学多元、共荣的社会意识，尽快终止“中医西医化”的做法。两千多年前，荀子针对儒学和墨学之间曾经出现过的相互非议，明确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卓越见解，期盼着不同学科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的客观态度，认真发掘相互间的不同，努力实现共同繁荣。对于当代中、西医工作者来说，荀子的期盼仍然具有不朽的现实意义。国家《宪法》的有关规定和“中西医并重”的总方针，应当切实地成为当代中、西医工作者相互信守的共处准则，并努力在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营造出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样一种多元和谐的氛围。第二，从正本清源入手，全力摆脱中医“西化”、“退化”的困境。病人惟恐医误其病，医家最忌病染在医。“多病之躯”的中医学如果不能复兴，无疑是天下病人的重大灾难。为要使中医从“西化”和“退化”困境中走向复兴，首当其冲的是要通过正本清源，对中医进行全面的自医。这就是尽快走出“西化”的误区；把颠倒了的文化信念、科学观念重新颠倒过来；把搞乱了的学术范畴、概念重新加以厘正；使中医早日恢复元气，重振生机。

对于当代中医所面临的形势，本人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中医兴衰存亡的两难关头，已经无情地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不言而喻，中医成功的自医，是我们面临的惟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中医的自医，就意味着新的突破，意味着中医的真正复兴。

1997年8月，崔月犁先生、诸国本先生与本人共同编辑出版了《中医沉思录》，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出版“沉思